

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张中元

【内容提要】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质量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作者利用全球128个经济体在1975-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一个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其经济增长。其二,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个经济体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的执政年数越长就越有利于其经济增长。其三,通过考察全球化指数与政治稳定性之间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即一个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政治稳定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非常显著,但随着该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升,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实现利益,从而降低了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政治稳定性的依赖。

【关键词】 全球化;政治稳定性;经济增长;动态面板模型;替代效应

【作者简介】 张中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04-0136-20

^{*} 本研究成果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项目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关注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如研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变迁以及生产率增长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 Thomas)指出,这些决定经济增长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①因此,最近的研究开始探求更深层次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②全球化和政治制度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全球化包含了经济、贸易、政治、信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除了直接的经济影响效应以外,还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思维习惯,对政治、社会等其他方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③而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诺斯以及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更加关注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优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了经济增长。^④

笔者利用全球128个经济体1975-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全球化、政治稳定性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促进其经济增长,政治的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贡献:其一,全球化程度难以测量,早期的大部分的实证研究以经济变量测量对外开放的程度,特别是采用对外贸易开放度作为对外开放的代理变量,而对全球化水平所涉及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有所忽略,这种测量上的缺陷可能会带来估计上的误差。因此对全球化指数的定义对于量化全球化来源和效应至关重要,笔者利用KOF全球化指数检验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指数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包括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可以更全面地考察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二,通过控制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检验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与经济

①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

② 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

③ Axel Dreher,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Applied Economics*, Vol. 38, No. 10, 2006, pp. 1091-1110.

④ 克劳德·梅纳尔编,刘刚等译:《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8页。

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及其原因,从而对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渠道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 文献回顾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同意全球化是构建有效的经济系统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全球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些研究以对外开放程度来测量某一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发现具有较高进出口水平的外向型经济会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将会促进经济创新和增长,而贸易保护会降低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全球化会使每个国家都受益。^①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加快了技术传播和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全球化也是一个侵蚀国家主权和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有争议的过程。^②

这些关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对全球化定义的差异造成的,因此研究全球化的影响首先需要给出全球化水平的客观的定量测度。^③ 近年来,一些研究利用瑞士经济学院编制的 KOF 全球化指数来测量某一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该指数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包括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阿克塞尔·德雷尔(Axel Dreher)采用 30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 1970—2000 年间的的数据检验全球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全球化会增加资本税,社会全球化也会影响经济政策,但政治全球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不显著。^④ 张春平(Chun-Ping Chang)和李建江(Chien-Chiang Lee)利用 23 个 OECD 国家 1970—2006 年间的的数据,检验全球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KOF 全球化指数的总全球化指数、经济和社会全球化指数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单向因果关系。^⑤ 除了全球化度量指标的选取会造成结论的差异外,全球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或不同经济体特征的异质性也会影响研究的结论,周先波等发现全球化对经济增

① Sebastian Edwards, "Openness,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at Do We Really Kno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No. 447, 1998, pp. 383-398.

② Robert Read, "The Implications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 Island Stat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No. 2, 2004, pp. 365-378.

③ Lant Pritchett, "Measuring Outward Orientation in LDC's: Can It Be Do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9, No. 2, 1996, pp. 307-335.

④ Axel Dreh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Taxes and Social Poli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 1, 2006, pp. 179-201.

⑤ Chun-Ping Chang and Chien-Chiang Lee,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9, No. 2, 2010, pp. 151-173.

长具有显著的正的边际影响,但其促进作用的增幅大小与全球化程度有关:全球化水平存在一个界限,当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小于这个限度时,开放度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超过这个限度时,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减弱;另外,全球化是否对某一经济体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还与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①

对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它们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可能导致其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政治制度不是单纯由历史或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决定的,而是由利益集团通过影响那些主导当前和未来资源分配的政治力量来决定的。政治科斯定理认为在给定初始的政治资源分配的情况下,不管是谁或是哪个社会集团拥有政治权力,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将会达到最优的制度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独立于政治资源的初始配置。^②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差异并非是导致不同经济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因为社会总会选择最适合它们的政策和制度,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因素阻碍着政治科斯定理的实现,其中政治稳定性就影响着政治制度的选择并决定经济增长,在政治不稳定的经济体中,追求自利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基于其未来的预期收益而选择次优或错误的政策与制度,如通过实施高税收政策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对公共物品投资不足、不为经济产出能力的提高而进行必要的投资等,这些均会使经济增长受阻。

无论是有序还是无序的政府权力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稳定,都表明了一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政权不稳定、政治两极化均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③ 亨利克·格顾勒(Henryk Gurgul)和卢卡斯·拉赫(Lukasz Lach)以政府变更的倾向性作为政治不稳定的测量,检验中东欧10国1990-2009年间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治不稳定阻碍了经济增长。^④ 阿里·艾森(Ari Aisen)和弗朗西斯科·维加(Francisco J. Veiga)采用内阁变动作为政治不稳定的测量,^⑤利用169个国家1960-2004年间的5年期数据检验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

① 周先波、李钜威、杨逢利:《关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非参数估计的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27-32页。

② Daron Acemoglu,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1, No. 4, 2003, pp. 620-652.

③ Baizhu Chen and Yi Feng, "Som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Issue 4, 1996, pp. 609-627.

④ Henryk Gurgul and Lukasz Lach,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wo Decades of Transition in CE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6, Issue 2, 2013, pp. 189-202.

⑤ 内阁变动被界定为1年之内任命新的总理和/或新的部长占据了50%或以上的内阁职位的次数。

响,结果发现每年每增加1次内阁变动会使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下降2.39%。通过考察传导渠道,他们发现政治不稳定性通过降低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阻碍了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经济自由化和种族同化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政治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弱的负面效应。^①奈罗·坎波斯(Nauro F. Campos)和杰弗里·纽金特(Jeffery B. Nugent)则发现在短期内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讲并没有明显的负向因果关系。^②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在一些国家中政治精英持续在位执掌政权被认为是造成经济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理查德·钟阿平(Richard Jong-A-Pin)证明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政治不稳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政权体制内的不稳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③钟阿平和雅各布·哈恩(Jakob D. Haan)发现在长期维持的政治体制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会降低。^④乔治·贝勒梯尼(Giorgio Bellettini)、卡洛塔·瑟若尼(Carlotta B. Ceroni)和乔瓦尼·普拉若罗(Giovanni Prarolo)利用模型证明,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长期在职,市场上的垄断厂商可以通过和政治领导人建立关系与拥有先进技术但没有和政治领导人建立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伯川德(Bertrand)竞争来降低行政审批成本,如果行政审批成本与产品质量升级费用相比足够高,垄断者厂商就可以维持其市场地位。这表明政治领导人长时间在职会导致短期内经济收益最大化,但长期来看,政治领导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阻碍了创新,进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瑟若尼和普拉若罗还利用62个国家1984-2008年间的数据分析了一国政治的持续性(political persistence)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行政审批成本高的国家中,政治持续性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在行政审批成本低的国家中,政治持续性并没有降低经济增长率。^⑤

有大量证据表明政治不稳定具有多个维度,乔治·贝勒梯尼、卡洛塔·瑟若尼和乔瓦尼·普拉若罗区分了政治暴力和集体抗议两个维度,^⑥奈罗·坎波斯和杰弗里·纽

① Ari Aisen and Francisco J. Veiga, "How Do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9, No. 3, 2013, pp. 151-167.

② Nauro F. Campos and Jeffery B. Nugent, "Who Is Afraid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7, Issue 1, 2002, pp. 157-172.

③ Richard Jong-A-Pin,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5, No. 1, 2009, pp. 15-29.

④ Richard Jong-A-Pin and Jakob D. Haan, "Political Regime Change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Accelerations," *Public Choice*, Vol. 146, No. 1-2, 2011, pp. 93-115.

⑤ Giorgio Bellettini, Carlotta Berti Ceroni and Giovanni Prarolo, "Political Persist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 No. 9, 2013, pp. 165-179.

⑥ Chetan Ghatge, Quan Le and Paul J. Zak, "Optimal Fiscal Policy in an Economy Facing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 Issue 4, 2003, pp. 583-598.

金特分析了温和的和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①钟阿平选取了25项政治不稳定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检验多维度的政治不稳定,他将政治不稳定分为4个维度:政治动乱、公民抗议、政权内部不稳定和政权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的这4个维度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②

以上研究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政治不稳定的概念,也可能是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所造成的。詹姆斯·布特克维茨(James L. Butkiewicz)和哈里特·亚尼卡亚(Halit Yanikkaya)检验社会、政治不稳定指标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社会、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简单、明显的关系,社会、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弱;政府不稳定与社会不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效果不显著,政治动乱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高收入水平且民主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与低收入水平且民主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社会政治不稳定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为明显。他们提出社会、政治不稳定和国家的其他一些特征一样具有持久的稳定性,但各国的经济增长不具有持久稳定性,这可能是二者之间缺乏显著性相关关系的重要原因。^③

总之,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存在一个一致的、简单线性的关系,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是状态依存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使二者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全球化、政治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效应结果,对此均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 估计模型设定

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设定如下:

$$\ln(Y_{it}) - \ln(Y_{it-1}) = \rho \ln(Y_{it-1}) + \beta' W_{it} + \gamma' PI_{it} + \delta' Z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为第 t 期经济体 i 的人均 GDP 水平, $\ln(Y_{it}) - \ln(Y_{it-1})$ 则表示了第 t 期

① Nauro F. Campos and Jeffery B. Nugent, "Who Is Afraid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pp.157-172.

② Richard Jong-A-Pin,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pp.15-29.

③ James L. Butkiewicz and Halit Yanikkaya, "The Impact of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on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27, Issue 5, 2005, pp.629-645.

经济体 i 的人均 GDP 增长率,如果右端 $\ln(Y_{i,t-1})$ 项的系数 ρ 是负值,表明在各经济体中存在条件收敛; W_{it} 是全球化指数变量, PI_{it} 是政治稳定性代理变量, Z_{it} 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其他经济、政治、制度等变量;向量 β 、 γ 与 δ 是待估计的参数, μ_i 是个体效应项, ε_{it} 是误差项。

将方程(1)稍做变形为:

$$\ln(Y_{it}) = \alpha \ln(Y_{i,t-1}) + \beta' W_{it} + \gamma' PI_{it} + \delta' Z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alpha = 1 + \rho$, 方程(2)是一个动态面板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 $\ln(Y_{it})$ 是 μ_i 的函数,所以 $\ln(Y_{i,t-1})$ 也是 μ_i 的函数,从而方程(2)右边的 $\ln(Y_{i,t-1})$ 与误差项是相关的,即使 ε_{it} 不存在序列相关,OLS 估计量也是有偏不一致的。通过组内变换消除了 μ_i 的固定效应估计量,其估计量的有偏程度是 $O(1/T)$ 阶的,故一致性依赖于充分大的 T 。同样随机效应 GLS 估计量也是有偏的。^①

笔者采用曼纽尔·阿雷拉诺(Manuel Arellano)和斯蒂芬·邦德(Stephen Bond)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 GMM 估计方法以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②该估计方法采用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惠特尼·纽维(Whitney Newey)和哈佛·罗森(Harvey Rosen)提出的用滞后变量作工具变量的方法,^③对模型进行两步 GMM 估计,得到的估计量是渐进有效的。但是阿雷拉诺和斯蒂芬·邦德提出的差分 GMM 估计量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有时会很弱,因此阿雷拉诺和欧米皮亚·博沃(Olympia Bover)^④以及理查德·布伦德尔(Richard Blundell)和斯蒂芬·邦德提出了系统 GMM 估计量(system GMM estimator)。^⑤由于系统 GMM 估计量采用了更多的矩条件,因此该估计量与差分 GMM 估计量相比提高了有效性,笔者主要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估计参数。GMM 估计方法还给出了当 ε_{it} 存在自相关时,检验差分方程中的残差是否存在各阶自相关的检验统计量,在通常的显著性水平下 AR_1 是显著的,而 AR_2 是不显著的;在 GMM 估计中,可采用萨甘或汉森(Sargan/Hansen)统计量来检验滞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① Badi H. Baltagi,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anel Data*, New York: Wiley, 2005, pp.128-139.

② Manuel Arellano and Stephen Bond,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8, No. 2, 1991, pp. 277-297.

③ Douglas Holtz-Eakin, Whitney Newey and Harvey Rosen, "Estimat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anel Data," *Econometrica*, Vol. 56, No. 6, 1988, pp. 1371-1395.

④ Manuel A. O. Bover,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68, Issue 1, 1995, pp. 29-52.

⑤ Richard Blundell and Stephen 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87, Issue 1, 1998, pp. 115-143.

不稳定的政治系统可能会降低投资、引发通货膨胀,最终降低经济增长,但如果一国社会经济状况良好,就不太可能发生政府权力变更,这也是为何政府认为经济、社会政策对保持其权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经济问题会引发社会紧张、政治不稳定,进而导致政府倒台,^①因此经济增长不佳也可能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之一。钟阿平发现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双向因果关系。^②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闪克·萨斯亚纳斯(Shanker Sathyanath)和厄恩斯特·瑟金迪(Ernest Sergenti)发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不利的经济冲击会增加社会冲突的概率,经济增长不佳会引发政治暴乱。^③德拉甘·米尔克维克(Dragan Miljkovic)和阿宾德拉·里马尔(Arbindra Rimal)利用122个国家1960-1988年间的检验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会影响政治不稳定,较高的初始GDP水平降低了无序政府变更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促进了政权的长期稳定性。但经济增长不能影响有序政府变更的频次,政府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巩固自己的执政权力。^④以上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与政治稳定性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因此需要将政治稳定性变量处理为内生变量。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

笔者采用以上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全球化指数变量、政治稳定性和其他经济、政治、制度等变量对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全球128个经济体1975-2012年间连续、不重叠的5年期^⑤平均人均GDP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LNY),其他解释变量也处理为连续、不重叠的5年期平均值,下面给出各解释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第一,全球化指数变量。全球化是一个模糊国家间界限、整合国家间经济、文化、技术、治理以及使国家间产生复杂相互依赖关系的过程,笔者采用阿克塞尔·德雷尔、诺埃尔·加斯顿(Noel Gaston)和皮姆·马滕斯(Pim Martens)设计的全球化指数(即KOF全球化指数)作为对某一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测量。2013年KOF全球化指数数

① Henryk Gurgul and Lukasz Lach,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wo Decades of Transition in CEE," pp. 189-202.

② Richard Jong-A-Pin,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pp. 15-29.

③ Edward Miguel, Shanker Sathyanath and Ernest Sergenti,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4, 2004, pp. 725-751.

④ Dragan Miljkovic and Arbindra Rimal,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 37, Issue 6, 2008, pp. 2454-2463.

⑤ 该5年期划分为1975-1979年、1980-1984年、1985-1989年、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2年这几个时间段,其中最后一期为3年期。

据库中涵盖了对 208 个经济体 1970-2010 年间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的全球化程度测量。在 KOF 全球化指数的三个维度中,经济全球化指数主要由商品、资本等实际流量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因素组成,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因素主要包括进口壁垒、关税、资本账户管制等措施,实际流量与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指数的构成中各占 50% 的权重;社会全球化指数主要包括人员联系、信息流动和文化认同,这三个方面在社会全球化指数中分别占 34%、35% 和 31% 的权重;政治全球化指数主要包括一国拥有大使馆数量、取得国际组织成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安全事务、签署国际条约等内容。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指数、社会全球化指数和政治全球化指数分别按 36%、37% 和 26% 的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其分值为 0-100,分值越高,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① 笔者用 EGI、SGI、PGI 和 GI 分别表示经济、社会、政治全球化和总全球化指数的得分。

第二,政治稳定性变量。政治稳定性变量采用政党在位执政时间(Prtyin)来测量,该变量是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持续执政的时间。^②

第三,控制变量。政治制度变量主要包括投票比例、有限任期、政党倾向性和政治体制。投票比例(Numvote)测量了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投票比例。有限任期(Finitrm)变量是一个哑变量,如果宪法规定在新的选举之前主要领导人的任期是有限的,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政党倾向性主要描述一个政党对经济政策的态度和观点,如果一个政党的观念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或其他右翼的,则该党归类为右翼(Right)政党,哑变量 Right = 1,否则 Right = 0。如果一个政党的观念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或其他左翼的,则该党归类为左翼政党(Left),哑变量 Left = 1,否则 Left = 0。如果一个政党是中间派的,则该党归类为中间派(Central)。政治体制(Regime)也是一个哑变量,如果某一经济体的体制是议会制(Parliamentary)的,则 Regime = 1,否则 Regime = 0。^③

经济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增长率(Popg),即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依存比率(Depend),即低于 15 岁的年轻人、高于 64 岁的老年人与 15-64 岁之间的工作人群的比例;外商直接投资(FDI),即流入某一经济体的净外资占该经济体 GDP 的比重;对外贸易(Trade),即某一经济体对外出口以及进口商品与服务的总和占该经济体 GDP 的

① 更详细的信息可参见阿克塞尔·德雷尔、诺埃尔·加斯頓和皮姆·马滕斯对指数数据升级时所做的说明。Axel Dreher, Noel Gaston and Pim Martens, *Measuring Globalization-Gauging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Springer, 2008。

②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

③ 投票比例、有限任期、政党倾向性和政治体制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

比重;工业部门(Industry),即某一经济体中工业部门增加值占该经济体 GDP 的比重;通货膨胀(GDPDF),即采用 GDP 平减指数测量的通货膨胀率,GDP 平减指数是当期本地货币计价的 GDP 与基期本地货币计价的 GDP 的比率。^①

基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共采用了全球 128 个经济体 1975-2012 年间的相关数据,由于部分经济体数据缺失,采用 5 年期平均后得到的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四 计量结果

表 1 给出了全球化指数变量、政治稳定性和其他经济、政治、制度变量对某一经济体经济增长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的结果。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 1975-2012 年间连续的、8 期不重叠的 5 年期平均人均 GDP(LNY),纳入到动态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的阶数为 4, L1. LNY、L2. LNY、L3. LNY、L4. LNY 分别表示平均人均 GDP(LNY)的滞后 1-4 期值。由于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引发政治的不稳定性,即经济增长率与政治稳定性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笔者将政治稳定性变量处理为内生变量。实际上,其他的解释变量也可能受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这些变量也被处理成内生变量。由于方程右端的变量都是内生变量,在回归时工具变量集合会很大,又由于滞后时间越长的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其有效性越弱,为了避免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估计时对被选择为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做了限定。检验模型设置的统计量中,Sargan 统计量都不拒绝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原假设,检验差分方程中的残差是否存在一阶自相关的 AR_1 统计量均在 1% 水平上显著,检验差分方程中的残差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的 AR_2 统计量在 10% 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因此模型的设置比较合理。

表 1 中第 1-4 列的全球化指数变量依次分别为经济(EGI)、社会(SGI)、政治(PGI)全球化指数和总全球化指数(GI),被解释变量滞后项 L1. LNY、L2. LNY、L3. LNY、L4. LNY 的系数除了第 2、4 列中的 L4. LNY 项外,其余都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滞后 1、3、4 期的系数均为正,滞后 2 期的系数为负。以第 1 列为例,此时 $\alpha = 1.154 - 0.473 + 0.147 + 0.102 = 0.93$,则 $\rho = 1 - \alpha = -0.07$,表明在各经济体中存在条件收敛,即初始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① 以上经济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 WDI 数据库。

表 1 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系统的 GMM 估计结果

	1	2	3	4
L1. LNY	1.154 *** (88.19)	1.163 *** (74.37)	1.189 *** (74.42)	1.180 *** (71.16)
L2. LNY	-0.473 *** (-22.51)	-0.497 *** (-31.81)	-0.514 *** (-25.51)	-0.517 *** (-29.88)
L3. LNY	0.147 *** (6.54)	0.225 *** (13.10)	0.221 *** (12.64)	0.238 *** (14.90)
L4. LNY	0.102 *** (7.75)	0.0199 (1.32)	0.0573 *** (4.58)	0.0232 ⁺ (1.63)
	EGI	SGI	PGI	GI
Globalization	0.00420 *** (11.49)	0.00472 *** (9.31)	0.000791 *** (4.48)	0.00432 *** (11.74)
Partyin	0.00183 *** (6.39)	0.00181 *** (6.29)	0.00130 *** (4.35)	0.00112 *** (3.66)
Numvote	0.0759 *** (7.76)	0.0591 *** (5.31)	0.0755 *** (6.58)	0.0718 *** (5.93)
Finittrm	0.0900 *** (8.83)	0.122 *** (11.32)	0.109 *** (8.79)	0.109 *** (9.23)
Right	0.00259 (0.27)	0.0379 *** (3.44)	0.0408 *** (3.33)	0.0414 *** (3.54)
Left	0.00937 (1.29)	0.0579 *** (5.45)	0.0435 *** (4.53)	0.0395 *** (3.84)
Regime	0.141 *** (21.75)	0.0743 *** (7.93)	0.129 *** (16.15)	0.106 *** (11.53)
Popg	2.577 *** (7.83)	1.841 *** (6.02)	1.830 *** (5.16)	1.815 *** (5.14)
Depend	-0.270 *** (-11.68)	-0.161 *** (-4.99)	-0.269 *** (-8.68)	-0.170 *** (-5.87)
FDI	0.131 *** (6.56)	0.300 *** (8.01)	0.401 *** (10.85)	0.271 *** (7.48)
Trade	-0.0741 *** (-12.56)	-0.0310 *** (-5.22)	-0.0248 *** (-4.23)	-0.0385 *** (-6.03)
GDPDF	-0.0820 *** (-12.13)	-0.0637 *** (-3.44)	-0.0842 *** (-4.49)	-0.0678 *** (-7.35)

续表 1

	1	2	3	4
Industry	0.390 *** (14.05)	0.511 *** (14.94)	0.392 *** (14.26)	0.450 *** (15.22)
常数项	0.304 *** (8.95)	0.310 *** (7.29)	0.236 *** (6.02)	0.220 *** (5.24)
样本数	389	420	420	420
AR ₁ 统计量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 ₂ 统计量 P 值	0.4858	0.4728	0.4087	0.4097
Sargan 统计量 P 值	0.3309	0.1059	0.1505	0.1682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分别表示 0.1%、1%、5%、10% 显著水平。

表 1 中经济全球化指数(EGI)、社会全球化指数(SGI)、政治全球化指数(PGI)和总全球化指数(G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这与卜哈斯卡瑞·劳(Bhaskara B. Rao)和克里希纳·沃德莱曼那提(Krishna C. Vadlamannati)的结论一致,他们采用 21 个非洲低收入国家的数据,检验总全球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化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①亨利克·格顾勒和卢卡斯·拉赫检验全球化的不同维度对中东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劲、稳健的影响,而政治维度的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太明显。^②

政治稳定性变量(Prtyi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执政的年数越长越有利于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持续执政时间每增加 1 年,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0.11% - 0.18%,因此政治的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政府更替频繁,会从两个方面降低经济增长率:其一,政府更替频繁会导致税收和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降低了投资水平,投资者希望稳定的政治环境。其二,许多模型证明领导人对其执政期限的不确定会使其选择次优的经济政策,从而恶

^① Bhaskara B. Rao and Krishna Chaitanya Vadlamannati, "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Low Income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Economic Modelling*, Vol.28, Issue 3, 2011, pp.795-805.

^② Henryk Gurgul and Lukasz Lach,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wo Decades of Transition in CEE," pp.189-202.

化继任者的经济状况。^① 托尼·卡波拉尔 (Tony Caporale) 和乔纳森·雷洛尔 (Jonathan Leirer) 利用美国各州 1975–2005 年间的数 据, 检验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发现美国各州的政治不稳定 (利用各州州长所在政党的轮换率测量) 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② 阿里·艾森和弗朗西斯科·维加发现政治不稳定、缩短政策制定者的任期不仅会导致政策制定者频繁变更政策, 从而引起经济不稳定, 而且会使政策制定者选择次优的宏观经济政策, 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表现。^③

表 2 全球化、政治稳定性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
经济增长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1)	(2)	(3)	(4)
L1. LNY	1.160 *** (102.99)	1.132 *** (68.92)	1.168 *** (94.30)	1.165 *** (76.05)
L2. LNY	-0.468 *** (-32.83)	-0.461 *** (-28.73)	-0.485 *** (-33.57)	-0.497 *** (-30.68)
L3. LNY	0.147 *** (9.85)	0.218 *** (12.65)	0.213 *** (16.89)	0.244 *** (16.71)
L4. LNY	0.0937 *** (8.96)	0.0268 * (2.02)	0.0530 *** (5.68)	0.0146 (1.20)
	EGI	SGI	PGI	GI
Globalization	0.00418 *** (13.85)	0.00526 *** (15.86)	0.00153 *** (7.48)	0.00514 *** (14.31)
Partyin	0.00146+ (1.74)	0.00731 *** (9.35)	0.00597 *** (4.51)	0.00798 *** (6.47)
Glob * Partyin	-0.000000770 (-0.07)	-0.000128 *** (-8.10)	-0.0000719 *** (-3.77)	-0.000129 *** (-6.09)
Numvote	0.0818 *** (9.74)	0.0587 *** (5.71)	0.0817 *** (8.15)	0.0790 *** (8.80)

① Alberto Alesina and Guido Tabellini, "A Positive Theory of Fiscal Deficits and Deb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7, No. 3, 1990, pp. 403–414; Guido Tabellini and Alberto Alesina, "Voting on the Budget Defici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1, 1990, pp. 37–49; Alex Cukierman, Sebastian Edwards and Guido Tabellini, "Seignorage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3, 1992, pp. 537–555.

② Tony Caporale and Jonathan Leirer, "Take the Money and Run: Political Turnover,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6, Issue 2, 2010, pp. 406–412.

③ Ari Aisen and Francisco J. Veiga, "How Do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pp. 151–167.

续表 2

	1	2	3	4
Finittrm	0.0980 *** (12.94)	0.113 *** (13.84)	0.0919 *** (10.45)	0.102 *** (11.14)
Right	-0.00138 (-0.21)	0.0313 *** (3.64)	0.0420 *** (4.14)	0.0358 *** (3.88)
Left	0.00570 (0.80)	0.0378 *** (5.12)	0.0426 *** (5.55)	0.0272 *** (3.40)
Regime	0.124 *** (14.63)	0.0867 *** (13.47)	0.120 *** (20.23)	0.0994 *** (15.27)
Popg	2.111 *** (7.13)	2.567 *** (7.42)	1.615 *** (5.76)	2.535 *** (6.78)
Depend	-0.237 *** (-12.02)	-0.236 *** (-8.06)	-0.276 *** (-9.48)	-0.212 *** (-7.01)
FDI	0.141 *** (5.58)	0.307 *** (8.05)	0.366 *** (10.44)	0.284 *** (8.17)
Trade	-0.0668 *** (-9.00)	0.00315 (0.49)	-0.0199 *** (-3.51)	-0.0160 * (-2.12)
GDPDF	-0.0766 *** (-9.32)	-0.0713 *** (-4.82)	-0.0988 *** (-6.85)	-0.0733 *** (-8.74)
Industry	0.399 *** (18.99)	0.464 *** (17.26)	0.379 *** (14.45)	0.428 *** (17.24)
常数项	0.266 *** (10.92)	0.282 *** (9.15)	0.247 *** (6.98)	0.180 *** (5.35)
样本数	389	420	420	420
AR ₁ 统计量 P 值	0.0000	0.0001	0.0001	0.0000
AR ₂ 统计量 P 值	0.4937	0.5953	0.4569	0.4220
Sargan 统计量 P 值	0.4813	0.2214	0.2882	0.2161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分别表示 0.1%、1%、5%、10% 显著水平。

表 2 给出了全球化、政治稳定性以及二者交叉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的结果,其中 Glob * Partyin 是全球化指数^①与政治稳定性二者的交叉项。该交叉项的系数除了在第 1 栏中为负但不显著外,其余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全球化指

① 第 1-4 栏分别对应经济(EGI)、社会(SGI)、政治(PGI)、总全球化指数(GI)。

数、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 (Partyin)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即某一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政治稳定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

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之间可能会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全球化通过对选民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治稳定性。杰克·沃尔斯 (Jack Vowles) 发现全球化会促使各政党的政策趋于一致,从而极大限制了选民的选择空间。^① 尼尔斯·斯坦纳 (Nils D. Steiner) 利用 23 个 OECD 国家 1965-2006 年的数据检验全球化与选举参与人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全球化会影响选举行为,降低选举参与人的数量。斯坦纳认为,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选民认识到全球化经济比封闭经济具有更强的约束力,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不同的选举结果带来的效用差异也变小,这降低了选民参与选举的意愿。^② 威尔弗里德·桑德-赞特曼 (Wilfried Sand-Zantman) 考察了全球化是否增加了政治领导人的执政能力,结果表明全球化对政治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提高了各经济体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从而增强了政治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降低了政策的效率从而弱化了政治领导人的执政能力。^③

表 1、表 2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除了数值大小有所变化外,其符号和显著性均保持一致,说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稳健。其中投票比例 (Numvote)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投票份额越高越有利于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投票份额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0.06% - 0.076%。有限任期 (Finittrm) 变量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如果宪法规定限制了主要领导人的任期,会显著促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对其经济政策选择等行为会产生很大影响,乔治·伊科诺米蒂斯 (George Economides)、阿波斯托里斯·菲利普伯皮尤勒斯 (Apostolis Philippopoulos) 和西蒙·普林斯 (Simon Price) 发现由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不会把当前政策的负面效应完全内部化。^④ 蒂莫西·贝斯利 (Timonthy Besley) 和安妮·卡斯 (Anne Case) 分析

① Jack Vowles,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Public Perceptions of 'Who in Power Can Make a Difference'? Evidence from 40 Countries, 1996-2006," *Electoral Studies*, Vol. 27, Issue 1, 2008, pp. 63-76.

② Nils D. Stein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Voter Turnout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Electoral Studies*, Vol. 29, Issue 3, 2010, pp. 444-459.

③ Wilfried Sand-Zantm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8, Issue 5, 2004, pp. 1001-1025.

④ George Economides, Apostolis Philippopoulos and Simon Price, "How Elections Affect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Revising the Mechan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4, 2003, pp. 777-792.

了1950-1996年美国州长的行为,结果发现当州长的任职期限临近时税收会显著上升,任期限制对州的人均收入有显著的负影响。不过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任期限制看似对经济发展有不良影响,但任期限制能减少政治中的自保行为,因为长期任职的官员所积聚的威权政治最后会损坏选举规则的效率,因此任期限制的引入从长期来说可能是有利的。^①

党内民主的发展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政党领导人选举过程中的变化趋势,许多政党公开他们的选举程序和候选人,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党内精英参选,并认为党内竞争的增加会降低党内寡头政治的倾向。奥弗·肯尼格(Ofer Kenig)考察了更多的党内人员参选是否增加了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结果发现较大的政党选举代表团的确吸引了更多的党内人员参选,但却降低了领导人当选所需竞争的激烈程度。^②因此,单纯依赖政党内部民主不一定能降低领导人的寻租行为,领导人可以通过限制其他人员的升迁来延长自己的执政时间,从而为寻租创造条件。特别是在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经济体中,企业与政治领导人建立长期的私人关系,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果非市场所决定,最终会降低经济增长率。^③如果宪法规定限制了主要领导人的任期,可以降低政治领导人通过延长任期来寻租串谋的可能性,特别是党内的政治竞争使得无能的政客要对政府的不当政策负责,他们会被有能力的政治家所取代,这种安排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政党倾向性中的右翼(Right)与左翼(Lef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某一经济体中具有明显政党倾向性的政府比中间派政党执政的政府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右翼或左翼倾向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以表1第4列为例,检验右翼(Right)与左翼(Left)系数相等的卡方统计量为0.03,其概率值为0.8526,从而拒绝该原假设。政治体制(Regim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某一经济体采用议会制比采用总统制会更显著地促进其经济增长。不少学者认为,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开放和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更容易实现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和实现公平竞争,因此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民主制度本身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丹尼·

① Timothy Besley and Anne Cas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1, No.1, 2003, pp.7-73.

② Ofer Kenig, "Democrat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election: Do Wider Electorates Produce More Competitive Contests?" *Electoral Studies*, Vol.28, Issue 2, 2009, pp.240-247.

③ Giorgio Bellettini, Carlotta Berti Ceroni and Giovanni Prarolo, "Political Persist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pp.165-179.

④ Julia Darby, Chol-Won Li and Anton V. Muscatelli, "Political Uncertainty, Public Expenditure and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0, No.1, 2004, pp.153-179.

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罗曼·沃茨阿格(Romain Wacziarg)采用154个国家1950-200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很多国家在经历民主转轨后出现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有不少国家的经济在民主转轨后出现了衰退。他们提出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民主制度是否对市场竞争和产权有效保护产生激励作用。^①因此笔者的这个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人口增长率(Popg)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口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依存比率(Depend)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该比率是低于15岁的年轻人和高于64岁的老年人与15-64之间(工作人群)人员的比例,这表明需要社会抚养的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人口数量和结构的转变会给经济、社会等带来影响。王颖和倪超选取1950-2009年26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与人均GDP增长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少儿抚养比^②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③与人均GDP的关系是不显著的,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中的18.7%。^④托马斯·林德(Thomas Lindh)和博·马姆伯格(Bo Malmberg)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1950-1990年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50-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上升显著促进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负向关系。^⑤

外商直接投资(FDI)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流入某一经济体的净外资占该经济体GDP的比重越高,越能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许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庄起善和李卢霞利用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7国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流入这些转型国家的FDI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FDI促进了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越稳定、市场化程度越高,FDI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⑥李怀建和沈坤荣以34个OECD国家1980-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会导致国内

① Dani Rodrik and Romain Wacziarg, "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conomic Outco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2, 2005, pp. 50-55.

② 指某一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③ 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④ 王颖、倪超:《OECD国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5期,第106-112页。

⑤ Thomas Lindh and Bo Malmberg, "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 OECD: 1950-1990,"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12, No. 3, 1999, pp. 431-449.

⑥ 庄起善、李卢霞:《FDI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7国面板数据的检验》,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83-93页。

产品种类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这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①

对外贸易(Trad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某一经济体进出口总和占该经济体GDP的比重越高,即对外开放度越高,其经济增长率会越低。迄今为止,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的国家经济增长实践和实证研究的支持,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是伴随经济发展阶段而不断演化的,这些都会影响研究的结论。包群考察了贸易开放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模型竞争性均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依赖于消费偏好、要素禀赋、研发效率以及技术差距等参数的综合作用,因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只在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一般情形下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②一些研究还表明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有条件的,经济体的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都可能使这一关系发生改变。吴力波和汤维祺对1960-2006年期间世界各国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则存在差异,进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性。^③

工业部门(Industry)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某一经济体中工业部门增加值占该经济体GDP的比重越高,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越快。不少文献根据克拉克定律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且在技术要求和技术吸收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了各产业增长速度的较大差异,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主导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条件,对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以及本国技术开发进行选择,以此加快本国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产业结构演进既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过程,又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笔者采用某一经济体中工业部门增加值占该经济体GDP的比重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升级,发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会促进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GDPDF)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通货膨胀率越高,该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越不稳定,越不利于该经济体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首先,长期过度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价格信号传递不顺畅,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规则,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并削弱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功能。其次,通货膨胀还可能会导致社会不

① 李怀建、沈坤荣:《FDI、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OECD国家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54-60页。

② 包群:《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载《世界经济》,2008年第9期,第3-18页。

③ 吴力波、汤维祺:《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再考察》,载《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第44-49页。

稳定,从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增长。最后,通货膨胀阻碍经济活动中的技术革新,削弱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在通货膨胀期间,卖方市场的出现会促使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片面地追求产品数量,同时通货膨胀也造成企业技术革新成本的增加,使技术革新由于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无法开展,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

五 结论

笔者利用 1975-2012 年期间全球 128 个经济体的相关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全球化、政治稳定性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无论是以总全球化指数还是以经济全球化指数、社会全球化指数和政治全球化指数作为全球化的测量,均发现某一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次,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执政年数越长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持续执政时间每增加 1 年,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0.11% - 0.18%,因此政治的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最后,通过考察全球化指数与政治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即某一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政治稳定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中: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投票份额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投票份额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0.06% - 0.076%。宪法规定限制了主要领导人的任期,也会显著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某一经济体中具有明显政党倾向性的政府较中间派政党执政的政府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执政党的右翼或左翼倾向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性的差异。某一经济体采用议会制较采用总统制会更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流入某一经济体的净外资占该经济体 GDP 的比重越高,越能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但进出口总额占该经济体 GDP 的比重越高,即某一经济体对外开放度越高,其经济增长率会越低。某一经济体中工业部门增加值占该经济体 GDP 的比重越高,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越快。某一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其宏观经济状况就越不稳定,且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质量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全球化正以某种不确定性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以及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国内社会的压力以及外

部因素(例如跨国公司日益独立于国家影响力之外)的作用,政府主导经济乃至政治的能力遭到削弱,造成一国或地区的政治、社会不稳定。原有意义上国家内部权力架构的弱化给一国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治理能力带来更大的冲击和考验。^①但另一方面,很多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因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无力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该国经济很难持续发展。

本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提出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升,经济增长对政治稳定性的依赖有所降低。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不同政治派别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争夺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此时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非常显著。但随着该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升,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实现利益,不用高度依赖“长期执政”来获得资源汲取的优先性或垄断性,使其有可能平稳地轮流参与执政(在变量中设定为领导人所在党派的持续执政时间),这表现为经济增长对政治稳定性的依赖下降,从而降低了政治稳定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②

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这既是西方国家推广其民主制度的结果,也是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所决定的。^③西方国家常常以经济上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的状况,把经济援助与是否实行民主挂钩,诱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化”以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民主化”尤其是多党制的实行,造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的政治冲突和动荡,各党派忙于争权夺利,破坏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取得预期的经济成功。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

(截稿:2014年3月 实习编辑:冷鸿基)

① 张运成:《论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与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第26-31页。

② 对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的这一解释来自于匿名评审的启发性评论。

③ 许开轶、蔡双根:《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3期,第75-79页。